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4.014

“有情”与“事功”

——沈从文家书(1966—1976)再解读

黄明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沈从文一生几经沉浮, 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中的某种遭遇和走向。1966—1976年间, 沈从文一家颠沛流离, 他为此频繁写作家书。从“有情”和“事功”两个视角读解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家书, 挖掘其潜藏在文本之下的话语蕴涵——乡土情结的重新阐释、家国忧思的深沉表达、生命意义的多重演绎, 可以据此深入探析社会变动与文人心态之复杂关系。

关键词: 沈从文家书; 乡土情结; 家国忧思; 生命意义; 文人心态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4-0104-07

引用格式: 黄明海. “有情”与“事功”: 沈从文家书(1966—1976)再解读[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4): 104-110.

“Affection” and “Achievement”: A Reinterpretation of Shen Congwen's Home Letters (1966—1976)

HUANG Mingha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in his life, which represents the encounters and trends of some intellectuals in the political vicissitudes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1966 to 1976, Shen Congwen's family drifted from place to place, so he frequently wrote home letters to his family. Reading Shen Congwen's home let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ffection” and “achievement”, and excavating the discourse implication hidden under the text-reinterpretation of local complex, deep expression of family and country worries,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life significance, can deeply explor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hanges and literati's mentality.

Keywords: Shen Congwen's home letters; local complex; family and country worries; life significance; literati's mentality

沈从文(1902—1988年)在中国作家行列中是一个独特存在。从20世纪20年代走出湘西走

上文坛, 到30年代成为“京派”的重要人物, 到40年代末淡出文坛、从事文物研究, 到80年代逐

收稿日期: 2020-05-09

作者简介: 黄明海(1993—), 男, 安徽安庆人,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渐得到国内学界认可，他的一生可谓几经沉浮。其经历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政治风云中的某种遭遇和走向，具有文人心态的象征意义。

普通读者对于沈从文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名篇，以及他对于“田园牧歌”的吟唱和“人性小庙”的构建。在主流文艺导向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矛盾中，1949 年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沈从文陷入了精神迷乱状态。期间，除了思想调整而创作和发表少量的“应景”诗文外，他多以文物研究和书信写作为日常之要。1966—1976 年间，沈从文一家经历多次离别：夫妻二人先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长子沈龙朱留在北京工厂上班，次子沈虎雏夫妇调往四川自贡工作，侄女沈朝慧因“户口”注销被迫流徙。一家人颠沛流离、天各一方，沈从文为此频繁写作家书。笔者根据 2009 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沈从文全集》22、23、24 卷的书信，统计得出：在 1966—1976 年间由沈从文亲笔所写的家书共计 224 封，收信人涉及 10 人，详情见表 1。

表 1 沈从文家书（1966—1976 年）收信人与数量

收信人（关系）	数量 / 封
张兆和（妻子）	108
沈虎雏（次子）	47
沈虎雏（次子）、张之佩（儿媳）	32
张之佩（儿媳）	14
张宗和（大弟）	10
沈云麓（大哥）	4
沈龙朱（长子）	3
沈红（小孙女）	3
沈云麓妻子（大嫂）	1
张宇和（四弟）	1
张宇和（四弟）、周孝棣（四弟媳）	1

书信作为一种非虚构的私密性文类，记录作者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学、历史等研究留下可供甄别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书信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是虚构文学的互文本，提供了作家的虚构文学的背景、原型材料”，“可以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为虚构类文学借取的形式资源”^{[1]20}。学界也称这类写作为“潜在写作”，正如陈思和所言：“作者写作的最初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其‘潜在’意义只是在于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创作，却具有某种潜性的文学因素，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这样一些文字档

案被当作文学作品公开发表出来，不仅成为某种时代风气的见证，而且也包含了作者个人气质里的文学才能被认可和被欣赏。”^{[2]104} 沈从文的日记和书信即被认为是“潜在写作”的典型。1980 年代以来沈从文书信的发掘、整理、出版，为研究沈从文后半生的文学活动、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等内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其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家书不同于一般书信，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形势下，对于沈从文来说，只有亲人才值得真诚相待、彼此牵挂，才能够敞开心扉、自由对话。上述 224 封家书以一种深入内心的“叙事”“达情”“论理”^{[1]16}，表达了沈从文对于时代社会、自然风物、人情世故的描摹与体悟。正如他在 1952 年 1 月 25 日左右写给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的信中，以夜读《史记》的方式谈论“有情”和“事功”的关系，指出两者“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社会中‘事功’相背斥，以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3]18} 这对矛盾反映出沈从文忧虑不安的精神状态，因为他自身对文学的要求是“有情”的，但对人生“有情”往往得不到亮眼的结果，还被人冷落和嘲笑，而在政治上的自我拯救又不得不“事功”。沈从文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二者对峙，而更多的是一种挣扎与调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学界对沈从文书信研究已有不少重要成果，近年来关注较多的是他在 1950 年代的“土改书信”，比如，李斌《沈从文的土改书写与思想改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 4 期）、姜涛《“有情”的位置：再读沈从文的“土改书信”》（《文艺争鸣》2018 年第 10 期）、姚丹《倾心“融合”还是漠然“旁观”？——沈从文川南土改行的思想史与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20 年第 2 期）等等，主要通过史料的挖掘与分拣，探究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思想改造的复杂性、成效及其意义。笔者通过研读沈从文 1966—1976 年间的家书，试图挣脱出以往苦难史的藩篱，从“有情”和“事功”两个视角读解，挖掘潜藏在文本之下的话语蕴涵——乡土情结的重新阐释、家国忧思的深沉表达、生命意义的多重演绎，并据此深入探析社

会变动与文人心态的复杂关系。

一 乡土情结的重新阐释

“乡土”一般被认为是沈从文的身份烙印和文学烙印。沈从文走出湘西后,在文学创作和空间位移上都曾有“返乡”经验。他曾在《〈边城〉题记》中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于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4]沈从文的前期创作就是这样将人性与人情倾注笔端。然而在“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5]^[17]之际,沈从文预感到写作和人生的“危机”,觉得“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5]^[19]。尽管后来经过思想调整和改造,融入“新时代”文艺政策的创作实践并不算成功;但是,乡土经验和记忆凝聚而成那种“情结”始终潜隐在他的内心深处。1969年11月30日,沈从文作为3户老弱病残职工之一,被首批从北京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1年8月转抵丹江;1972年2月获准回京治病。沈从文以下放的形式由城市回归乡土,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共写作了66封家书。相较于他的“土改书信”,这批家书内容更加多元,其乡土情结在“有情”与“事功”的努力调适中得到重新阐释。

首先表现在重返乡下的“自然”心态。1970年3月10日回复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这样写道:“绝料想不到廿多年前过去八年乡居生活,快七十岁了又还会来到这么一个几乎和一切隔绝的乡间。这变化,是熟人也难想象的。我却毫不以为意,认为极其自然。有时去厨房取饭时,躺在灶前柴草堆上,和日夜辛勤劳动的大师傅谈天。或看看他们说笑。觉得生活极新鲜,远比过去外出参观得益。近来食量略有增加,也反映新生活的适应是逐渐的,有进展的。”^[6]^[271-272]沈从文在这里表现出对“新生活”的极大兴趣,自称“乡下人”的他并不缺乏乡土经验的记忆,在他身上自

然乡土是作为一种“有情”的审美而存在的。来到“一个几乎和一切隔绝的乡间”,远离政治中心的压抑空间,沈从文的心态相对“自由”,并且可以进一步深入生活、接受教育、调整思想,以免又在某些问题上犯下错误。当然,这样对新生活“有情”的背后,还隐藏着“事功”的社会压力和自我鞭策。

湖北双溪的生活条件比之城市相差甚远,加上气候湿热、日常劳动,沈从文的身体经受了巨大考验,“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6]^[250]但他苦中作乐,时常写作诗文,文物研究亦不落下。由于沈从文1950年代已在川南经历过一次改造,因此他对干校这种生活方式,似乎“习以为常”。当时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与沈从文有同样遭遇,他们大多接受过“五四”新思想的熏陶,经历过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动乱艰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几无幸免。沈从文写给沈虎雏的家书就曾提到:“巴老伯至今还在‘写检’,可不知为什么老没完了。卞诗人等已集中学习,将春播交公社,大致将‘打道回衙’了。永玉等似乎也已开始以学习运动为主,不过每日还依旧‘操跑步’,永玉、刘焕章还拖得下,七十岁的刘开渠、吴作人等也是‘适可而止’。”^[6]^[493]沈从文连同这些知识分子的“自然”心态,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思想改造中的一种“趋时”,大家循序渐进并伺机寻找“自我拯救”的途径。

其次表现在乡土“风景”的生动描摹。1971年5月28日正值端午,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描绘小镇的热闹场景:“恰值晚晴,空气透明,各个村庄如新洗过,事实上区里墙上是新洗刷过,不必要标语全扫除或撤掉了,区革委门前也清清爽爽。环境比王维画卷还清润得多,动中有静!小溪上流转弯处,有六七张撮网插在水里,老、中、青农民具备,在截流等鱼,可不是捕!两岸水旁约六十各式顽童,集中注意等待起网,上下还有三个撒大网的弯着腰,来回走动。每遇二三寸小鱼在网中跳跃时,孩子们即齐声欢呼。我看过上千名画,上百种农村人事景物画,什么王维、韩混《捕鱼图》,可没有这小镇上的捕鱼图活泼生动!”^[6]^[503]这番富有地域特色的“新生活”场景,相比北京街巷贴大字报、机关夺权、武斗等活动,自然要轻松、活泼、生动得多。在沈从文的审美

观念里，“乡土”是自然地理和风俗人情中触动心灵的那些部分，这种气质源自他从小获取的自然山水的滋养。“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7]101} 尽管家书不是有意为之的文学创作，但是基本的话语思维早在童年和启蒙阶段就已形成，因此，在干校期间自我的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以及对乡土风物的描摹，都反映出与“水”的隐喻关联，即是“有情”的一脉，正如他说：“水教会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的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7]103} 无怪乎有研究者认为：“水是沈从文的生命、生活，也是他的文学事业的源泉乃至他整个精神世界的象征，水是他的人格追求——恬淡、柔濡、强韧，水更是他人生态度的外化——善万利而不争。”^[8] 置于当时的社会语境，反映在书信当中的这种人格追求和人生态度如同一股“清流”。

然而细究起来，这些家书体现出来的“乡土情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深入生活”的实践结果，是被赋予了“历史感”的心境。沈从文在家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过下放干校后的收获：“我觉得到这里三个月，比过去十年参观大工厂大农场，住大招待所有意义。特别是对比下，更明白多一些问题。不下来是什么也不懂得。只看到好的一面，不看到有待努力才能转好的一面，以及在努力中如何取得进展的情形。知识分子不分等级、男女、老幼共同劳动情形下，如何改造自然的伟大努力，就明白多了。”^{[6]254} 信中关于“知识分子不分等级、男女、老幼共同劳动”的说法，出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强调各行各业突出政治学习，在尊重分工的同时兼学别样，“建立一个劳力与劳心平衡的平等社会，培育一代革命新人。”^[9] 结合沈从文的家书来看，彼时的他在思想上仍在努力向着“新人”靠拢。因此可以说，沈从文所“看”到的并非只是表层意义上的乡土景象，而是经过意识形态规训后的“风景”，是其“有情”的心灵审美与“事功”的历史反思相结合的产物。这背后是沈从文在心理意识层面对身体病痛、生活环境、人生遭际等因素的“克服”与“理解”，“改

造自然”的伟力也促成了他的“自我改造”。

二 家国忧思的深沉表达

1979年以前，沈从文在国内一直是被主流文艺“边缘化”的作家，其中的矛盾实质是他的自由主义观念与新政权的阶级意识形态相抵牾。这并非说明沈从文从未关注或者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相反，他一直想努力从被“游离”的状态中融入“新”社会，成为“新人”中的一员。1949年5月30日，沈从文自杀未遂、放弃彻底的解脱后，他在孤独中思考“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3]43} 而又陷入“想不清楚”的苦闷。到了1969年11月26日即将下放干校时，他心中所想的是：“如此离开，也十分好。用实践来拥护主席，或可补足拙于语言弱点，以后还要用新的实践，战胜热湿和滑倒的意料所及困难和体力上的意外困难。我相信是会作得到的，能和近半世纪以来一样，用一种极端素朴态度活下去，学下去，工作下去。才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好意和期望，……我总相信在乡下不是养老，还将有可能在新环境中作些有益于国家的事情。”^{[6]237} 从沈从文20年间的思想转变可以看见，他在“改造自我”中以特殊的文学形式书写个人情怀，始终把国家和人民放在心里。如果说乡土情结是“有情”的主要体现，那么，忧国忧民则侧重于“事功”的彰显。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有情”的温度，“事功”才显得真切。沈从文在家书中大量谈论社会状况、工作学习、青年思想等问题，透露出对家国的深沉忧思。

其一是对分内工作的执着与坚守。经历了精神危机的沈从文，1950年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结束后回到博物馆工作，把所有心思放在文物研究上。“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1966—1968年间住处8次被查抄，大量私信、书籍和文稿被没收，先后作过大小60多次检讨。下放后研究计划被迫中断，“工作一搁数年，也就等于否定了。”^{[6]315} 尽管面临研究荒废和身心俱疲的状况，沈从文依然忍痛坚持：“我这点剩余生命，主要意义还是工作。能充分把廿年所学，充分应用到国家需要方面去，就十分好。既不需要什么名位利益，也不要别的非分好处，能把有限精力全部用到工作

上去,不辜负廿年党的支持和鼓励就好!这也是近廿年能耐得住寂寞守在工作上的原因,不至于犯大错误原因。”^{[6]320}从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的文物研究成果来看,沈从文一直在“与生命抢时间”^[10],他付出毕生所学和精力完成了国家交代的任务。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写信告诫儿子:“好好工作吧,不明白的事沉默对待,可少错误。工作多担负些,向(好的)解放军学习看齐。向优秀党员(真正优秀的)和同志看齐,即可望提高而少出意外。谦虚谨慎不怕多,不宜忘。”^{[11]5}沉默、谦虚、谨慎是沈从文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处世态度,信中的“(好的)”和“(真正优秀的)”是后来添加的限定词,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当时世态人心的某些判断。他希望儿子能够明辨是非,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

其二是对家国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沈从文在融入新社会的过程中,尽管“看不懂大局,却注意到一些现象”^{[12]207},也试图预想未来可能导致的后果。早在1966年7月4日,沈从文写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就曾提醒他:“你应当常看报上社论消息,上面刊载文章,多和目下在全国范围内几亿人行动有关系,也和此后国家发展有关系。今后有许多事变化必十分大,你手边若还有点钱,可决不要随意花去。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着回到家乡的。”^{[6]19}先前历经风波的沈从文,这时已经非常清楚在社会变动中个人命运的无法掌控,并且作出了最坏打算,为自己留下后路,这难免让人读之涌出悲凉之感。又如教育问题:“一个国家有八年大中小不上学,情形是惊人的,不仅影响到当前招生,还必然影响到今后工业建设一系列问题。似乎得‘亡羊补牢’。已在亡羊补牢。补之又补,而依然还会影响到今后教育和其他,延迟或落后一大段。特别是工业化进展,且有可能有些后遗症,比较上说即‘后退’。”^{[11]60}“国家令人忧心处,还不只是目前,最大痛苦也许还在将来。只是这个必然出现的将来,从现在种种,已大略看得出一个轮廓。”^[13]上述摘录只是家书中的部分缩影。这种关注和思考反映出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意识,即便身处漩涡、受到冲击、死之将至,他们也要借“信”发声,不论建议还是牢骚,都承担着历史落到个人身上的重量。

其三是对青年群体的忧虑和批评。1966年7月间,就在沈从文写信给大哥不久后,他“被调回博物馆参加学习。等待着他的,首先是‘大字报’”^{[12]187}。从目前全集收录的资料来看,1966年7月4日到1967年2月2日期间,沈从文没有书信寄出,这段时间他在接受检查、交代问题、遭受批判,其中所承受的压抑、责难、恐惧可以想象而不能言明。1967年5月11日写给张之佩的信中,沈从文对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现象深怀忧虑,一吐心中愤懑:“许多人多像是无所事事,不知作什么好,看来令人忧虑。上万的路人,极少有人在路上看报纸社论。事实上很多大致看不懂报纸社论,不明白重要性。我心中总不免怀有一点杞忧。一种深刻的杞忧。同时也可以说是不可必要的杞忧。得想办法正面教育。”^{[6]38}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年,沈从文的话语要害直指一代青年被蛊惑的无知和盲从。他对年青作家的批评同样一针见血:“年青作家之失败,是能空疏华美不会素朴的叙事,从素朴得到感人效果。总是欢喜用些不相称的形容描写,画蛇添足。”^{[6]185-186}信中的无奈和忧虑不仅在于青年,还隐性地指向幕后主导者。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文学训练和创作模式的失败,“仅仅从到处去参预三大斗争实践,不练笔,十年八年还是写不出好文章”,“加上近廿年不出校门的大跃进冒头的少壮,照年份已成主要教写作的骨干,有的可能就从来自己还不曾写过一篇像样文章,而满脑子正确观点,能理论而不会叙事”^{[11]61}。

除此之外,沈从文在双溪见证围湖造田、开山挖矿等种种壮举后,创作了一批旧体诗,《大湖景诗草》就是其中一组代表作。“诗中流露出对‘五七指示’的正面歌颂,对社会主义、反帝反修坚决拥护的情绪,一点都不亚于同期主流文坛的其他诗作。”^[14]这与陈思和提出的“潜在写作”中第三种原因相吻合:“作家的身份受到限制,或是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自由,他们的创作不一定与国家政权或者现实社会制度处于自觉的对立立场,有的只是抒发个人的情愫,有的甚至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定程度的迎合。”^{[2]108}沈从文作旧体诗“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是采取一种在规限中迂回前行的方式。他一方面以旧体诗的形式叙述历史文化,记录自己的文物研

究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借助创作排解胸中苦闷，并以此作为融入新生活的文学实践。这些无疑为其“潜在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注脚。

三 生命意义的多重演绎

沈从文一生游走在城乡之间、政治边缘，将个体的生命状态融进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但他始终保持一种与现实紧张的对话关系。他对生命、人情、人性的体验和感悟十分通透，甚至带有宿命论的思想。有学者认为：“在沈从文早期构筑的湘西世界中，人物似乎永远不为外部世界所扰，他们固守着‘常’的生活形态，不追究生活的意向，这是一处于原始自然状态的生命形式。”^[15]而在沈从文的后半生，时势不再允许他固守于“常”，从死神手里捡回无法自足的生命后，他在“深入生活”中重新理解自然乡土。他看穿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勘透了命运和生死。他早期构筑的“湘西世界”在“现代”政治与文明的侵扰和冲击中，只剩下“残垣断壁”；同时，国家的危难与生命的消逝又让他心生忧患，无法卸下肩负的责任，也不愿停止前进的步伐。正是在这种“有情”与“事功”的矛盾纠缠、互相调适中，本就具有忧郁气质的沈从文，对生命意义的演绎呈现出多重样态。

首先是在病痛中感怀生命无常。沈从文晚年遭受疾病，尤其是高血压和心脏问题的折磨。有研究者曾考察沈从文的家族精神病遗传基因，这种研究对于打开沈从文敏感的心灵世界具有一定意义^[16]。沈从文几乎每次写信都会提到身体不适或者诊断治疗情况。他“提提恐来不及说到的问题”^{[6]250}，并叮嘱亲人注重健康诸事，可见他对随时可能消逝的生命做了必要准备。这样的预判似乎显得极其冷静，但是冷静之外尚有犹疑和无奈，这从书信文本中涂改增删的部分可以看出端倪。比如，1968年5月16日写给沈虎雏的信中，有一段文字被涂改划去，但大部分字迹可以认出：“我会突然完事的，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出来五十年，在旧社会工作，已尽了自己能尽的力，思想上虽比较保守，却从未搞政治投机。新社会近廿年，因为无□□野心。”^{[6]135}划去这段文字后，沈从文继续写道：“我因思想保守又胆小怕事，廿年来工作上不可免会犯了些大小错误，一一待检查批判。”^{[6]135}这两段话传达出来的意思导向有所

不同，前者意指安分守己，死之将至亦无遗憾；后者则偏向于个人反省。删除文字的行为，说明原先的写作思路被某种突来的主观考虑所打断，这正是沈从文犹豫和矛盾之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其可能触及到了内心关于过去和正在遭遇的人生困苦的回想，这难免让他心生酸楚、悲凉和遗憾；另一方面，他也想传递较为积极的信息，引导儿子乐观生活、反省进步；甚或有为预防查抄的考虑。不论何种假设，沈从文对生命无常的感概无疑是深刻的。

其次是在孤独中感恩真情实意。从前文统计来看，1966—1976年间沈从文给10位亲人写过家书，其中给妻子张兆和的信最多。从1929年相恋到结成婚姻家庭，再到历次运动被迫分离，这对伉俪风雨兼程、互为支持，他们在患难中诉说生命的感想。沈从文1971年6月19日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较为典型：“我像本不是什么好演员，可是机会特别离奇，几乎可说生、旦、净、丑都申演到了。凡是似乎应当懂的，到大都市五十年，我几乎还都没有懂。人情世故就还不懂。凡是看来我不大可能会的，用不上什么特别努力，可又学会了。因此中国文化许多部门都有个一知半解，有的或比什么专家还深些。每一回改业近于‘前功尽弃’，我却从不丧气，又从头起始学去。这里有人见我穿有纽扣的汗衣，觉得奇怪。这和我写旧诗差不多。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对几十年老熟人和生人，都像是不会知道我是怎么生活下来的，学习下来的。倒还是少数几个死去的旧熟人，值得怀念。特别是有几个在我极卑微困境中，就能欣赏我某些方面与众不同处。或原本并不怎么相熟，而且始终也不一道，却永远对我极抱好感的。也有的还活着，对我从不失望，你就是一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因为没有你，还是早崩毁了。”^{[6]522-523}从整段如泣如诉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沈从文那种隐忍的忧郁和真挚的性情。他以社会为舞台，自比“不是什么好演员”来表明自己不懂世故，换个角度来说是其内心的淳朴和真善跟时代之间的纠葛。怀念知音、感恩伴侣、发现自我，是沈从文在暮年对生命的回望与思索。

再次是在动荡中保持思想独立。沈从文在家书中不止一次反思自己的性格弱点：“我一生弱点即能‘处常’不善‘应变’，能‘任劳’不善‘任

怨’。”^{[6]93}“处常”即保持生命原始自然的情态，而“应变”则需要审时度势；“任劳”是肉体被奴役，“任怨”则是精神的奴役。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努力摆正位置，正确认识自我、反省自我，他的能“处常”和不善“任怨”恰好表明其思想的独立性。在限度中表达潜在的意涵，作家书即是最好的印证。沈从文在历次运动中的遭遇及其应对，跟他追求自由却能隐忍、生来忧郁却仍乐观的性格不无关系。沈从文曾向大哥倾诉：“这次运动中，不少知名作家，全在大冲击中垮了。凡是和阎王殿有点关系的，无不受一定冲击。凡是过去和‘蒋记’有关联的，冲击更难免。有的熟人，如思成、巴金，是在上万人大会中批判过来的。我因为近卅年来，前廿年不依傍过蒋，近廿年又不沾文学，不和周扬有什么关系，只老老实实在博物馆搞文物工作，不怕沉闷寂寞，也不怀什么名位野心，凡事从头作起。有一次让我去作老舍作的那个北京市文联主席，也不去，宁愿守着午门楼上陈列室作说明员，或钻库房搞文物登记，一个大学生也受不了的工作，我却一作廿年。”^{[6]169}从沈从文的信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社会历史变迁对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深刻影响。沈从文行笔时对于历尽沧桑、忍辱负重的克制，那种逆来顺受、退守一隅、不争名利的心态，是其明哲保身的选择，也显示出其在是非颠倒的社会何以“处常”的生命理念。

沈从文因其乡下出身、性情养成、体病多发、政治站位、文学选择等因素，对“生命”的感触格外深刻。由于奔波消耗、渐趋年迈导致肉体的疾病，沈从文发自内心地感怀生命无常、感恩真情实意；家族遗传的精神病症因遭逢社会历史变迁而异常活跃与敏感，形成了沈从文后半生的心理危机以及“病”的隐喻现象，也此开启了他对自己生命和思想双重疗救的漫长过程。

20世纪中国在战争、运动、改革等变局中开拓崛起，文学除“启蒙”“救亡”“改造”等共名写作之外，类似书信这样的文本，实际上对社会历史起到了一种补充甚至是正解的作用，它较为明显地表现出社会变动与文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詹明信曾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

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7]从前文梳理可以看到，1966—1976年间，沈从文时刻关注政治动态，下放干校后描绘“新生活”场景，创作历史文化题材的旧体诗，返京治病后与生命抢时间，克服困难开展文物研究工作，凡此种种，他都在努力着希望从“个体”融进“群体”。沈从文写作家书时将功名利禄排除于外，因而其书信更贴近其内心世界复杂而真实的想法，可以当作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关于生存、价值和命运的寓言来解读。

易代之际，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到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撇开了从文学创作上直接进入新纪元的路径，而是以“事功”的外在方式满足“有情”的精神需要，在心态上做了一种主观的迂回，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接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并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12]83}所以，从乡土情结的重新阐释、家国忧思的深沉表达达到生命意义的多重演绎，沈从文始终是在“有情”的人生底色上勾勒“事功”的历史轮廓，以此获得处世的“安心”，并给世人以“处常”的观感。这种调和矛盾的心态一直伴随沈从文度过余生，其也是理解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如何在历史转折阶段重新认识历史，以及调整个体与历史的关系的重要参照。

20世纪中国社会变动与文人心态的关系错综复杂，正如张新颖所说的那样：“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12]354}沈从文辞世已经30多年，伴随史料的不断发掘和理论方法的不断更新，一些立足于文学社会学、思想史、情感史等视野的沈从文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未来的研究路径又将作何演变？或许沈从文自己早已预感并解答了这一疑题：“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我’。”^[18]

(下转第132页)